

中日關係史考

王
勇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中日关系史考

王 勇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京)新登字 3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日关系史考/王勇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 1

ISBN 7-80109-048-9

I. 中...

I. 王...

II. 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

N. D829. 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4) 第 14076 号

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 邮编 100032)

北京经纬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 千字 200

1995 年 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500 册, 定价: 12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缺页破损, 请寄回更换)

序

中日两大民族之间具有的渊源流长的文化关系，曾经把两国置于一个共同的文化圈内，而对两国的文化及超越文化的方方面面给予了深刻的影响。这是亚洲及世界文明史上一个独特而又伟大的存在，它的影响波及于今天。因此，中日双边关系这个研究题目，便具有了自上古以来一直流动着的丰富的内容，成为学术研究者耕耘不已的领域。

王勇教授任职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所长，是近十年来在我国学术界崛起的一位青年学者。他的一系列论著，出题新颖，发想力丰富，视野开阔，又特别注重材料的发掘与验证，以创造性的思维，活跃于国内外的学术舞台。现在，王勇教授的新著《中日关系史考》，以四篇十六章的篇幅，又呈献于读者，令人欣喜。

综观当代中日双边研究，队伍壮大，层面宽阔，不少论著表现出研究者的睿智。但我以为有两个问题，也是亟需辩明的。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研究的立论与研究的视

角问题。双边文化研究，有时会涉及民族情绪。八年前我在拙著《中日古代关系史稿》的“前言”中曾经说过：“执着于民族主义的研究家，常常把揭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的联系、排斥、包融与反馈的诸种研究，斥之为意在否定作家与作品的个性、试图抹煞文学的民族性等等。从事这一研究，有时不得不承担如此重大的责任，岂不让人如履薄冰，胆战心惊”。实际上，中日双边研究中的民族主义，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历史传统。如果反省历史上中日诸位先辈的学术，那么，像“大中华主义”与“大日本主义”常常是他们观察与判断双边关系的基点，从而模糊了许多事实。近代学术的基本特点，便是要求人文研究者把双边文化关系作为一个客观实体加以对待，并以文物文献的二重证据来揭示这种关系的真实内容。惟有内容的真实，才有可能依据科学的思维接近史实的本质。这或许正是辩证法与唯物论对研究者的基本要求。王勇教授在一系列的论述中，摒除历史上迂腐的成见，强调从客观事实出发，构筑研究的基点。他的日文版大著《超越时空的圣德太子》，在基本立论的科学性与客观性方面，给我十分深刻的印象。这次呈献于读者的新著《中日关系史考》，当我读第一章《平安迁都的原因与意义》时，便深为著者所显示的公正的学术立场所感动。一个研究者在自己的研究活动中，能够确立属于自身的而又具有科学性的立论的基点，并由此构架起观察的视角，形成自身的学术观点，并逐步形成体系，这是十分不容易的。王勇教授的论著，已经开始显现这一特点，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研究材料的发掘与验证问题。人文科学的研究，任何假设和立论的基础便是材料。本世纪初，敦煌文献的发现和甲骨文字的出土，大大地推动了人文研究中的史料观念的发展。先辈学者王国维等由此而倡导“二重证据法”，并依此验证各种假设立论。这在本质上符合近代科学史观。一个称之为“学者”的文化人，如果一生中都未曾做过关于史料的发掘、认识和

验证的工作，那么，他的所谓学术，其实都是值得怀疑的。但是，材料的发掘和验证，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并非急功近利之徒所能操作。当前国内学术界，靡夸之风盛于一时。研究者有时竟把相距 2000 年的材料拿来互证，有的又把前人与今人已认定的作伪材料拿来翻弄谱新。其实，没有老实诚恳的态度，是做不得长远的学问的。王勇教授在这一方面具有特别的自觉。10 多年前当他步入这一研究领域时，便在文献学的各个方面自行补阙，其勤奋好学的精神令人感动。细读他的每一篇论著，都能感知其中较为坚实的材料基础，并且越来越多的是属于他本人发掘的新材料，例如《胜鬘经疏义私钞》及其来龙去脉，都是由他考定验证而近日才为学术界所知晓。把自己的研究建立在尽可能可靠的史料的基础上，反复验证，去伪存真，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自己欺骗自己，更不欺骗读者，这样的学术，才能对人类文化与文明的进步，尽到自己的责任。这是一个学术的观念与方法论的问题，同时，无疑也是一个学术的道德论的问题。王勇教授的研究与论著，在这方面可以显见他成熟的步伐。

我和王勇教授相识有 10 多年。两人因为同行同道，所以常在国内外相见。我或许是目睹王勇教授从硕士成长为大学教授的朋友们中的一人。我深知他在这条路上，洒尽了心血，也表现了勤奋与睿智。我和他相比，自愧不如，仅是我比他虚长了十数岁，所以此次新著公刊，我作为最早的读者之一，愿意把对他学术的理解介绍给诸位，并以此为序。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七日 于日本京都
中国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教授
(国家博士学位指导教师)
日本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客员教授
严绍澍

目 录

· 历史篇 ·

序	严绍澍
第一章 平安迁都的原因与意义	3
一、迁都与择地	4
二、迁都与革令改政	6
三、中日古都之比较	9
四、平安文化的特色	11
第二章 圣德太子与魏晋玄学	14
一、精通《三玄》	15
二、涉猎《庄子》	19
三、执麈谈玄	22
第三章 唐人郭务惊使日事迹述略	29
一、百济亡国始末	29
二、白村江海战	31

三、日本的对唐政策	34
四、唐使刘德高赴日	37
五、郭务悰三度使日	40
第四章 五代日僧宽建一行人华事迹考	44
一、中日关系史上的“五代”	44
二、宽建入华年代考	45
三、宽建一行在华事迹	48
四、巡礼五台山之遗物	51
五、日本文化的输出	55

• 典籍篇 •

第五章 汉籍宏观研究的构想	63
一、汉籍广释	63
二、中国汉籍	66
三、域外汉籍	69
四、海外佚书	71
五、超越国籍	73
第六章 汉籍东传诸说考辨	76
一、秦人东渡与徐福赍书说	76
二、倭人西征与新罗掠书说	81
三、文化纳贡与王仁献书说	86
四、简短的结语	90
第七章 《庄子》东传考略	92
一、显宗天皇	92
二、圣德太子	94

三、大友皇子	97
四、姑射山	98
五、道公首名	101
六、《日本国见在书目录》	102
第八章 唐宋时代日本汉籍西渐史考	104
一、唐代传入中国的日本汉籍	105
二、宋代传入中国的日本汉籍	109

• 文物篇 •

第九章 麈尾在日本	119
一、麈尾东传	120
二、正仓院现存麈尾柄数	121
三、麈尾的形制	125
四、麈与麈毛	126
五、麈尾盒	127
六、结语	128
第十章 日本摺扇的起源及在中国的流布	130
一、团扇之东渐	130
二、日本始创摺扇	132
三、桧扇源出简册	134
四、蝙蝠扇的渊源	137
五、摺扇传入中国	139
六、明代的日本贡扇	141
七、摺扇风行于世	143
八、摺扇的仿制	145

第十一章 角笔与角笔文献	149
一、古籍中有关角笔的记载.....	150
二、角笔文字的书写工具.....	152
三、角笔文献的分类.....	158
四、中国角笔文献的探索.....	159
第十二章 中日美术工艺之交流	164
一、中国画谱在日本.....	165
二、中日两国的《潇湘八景图》.....	168
三、螺钿工艺.....	173
四、日本绘画之西渐.....	1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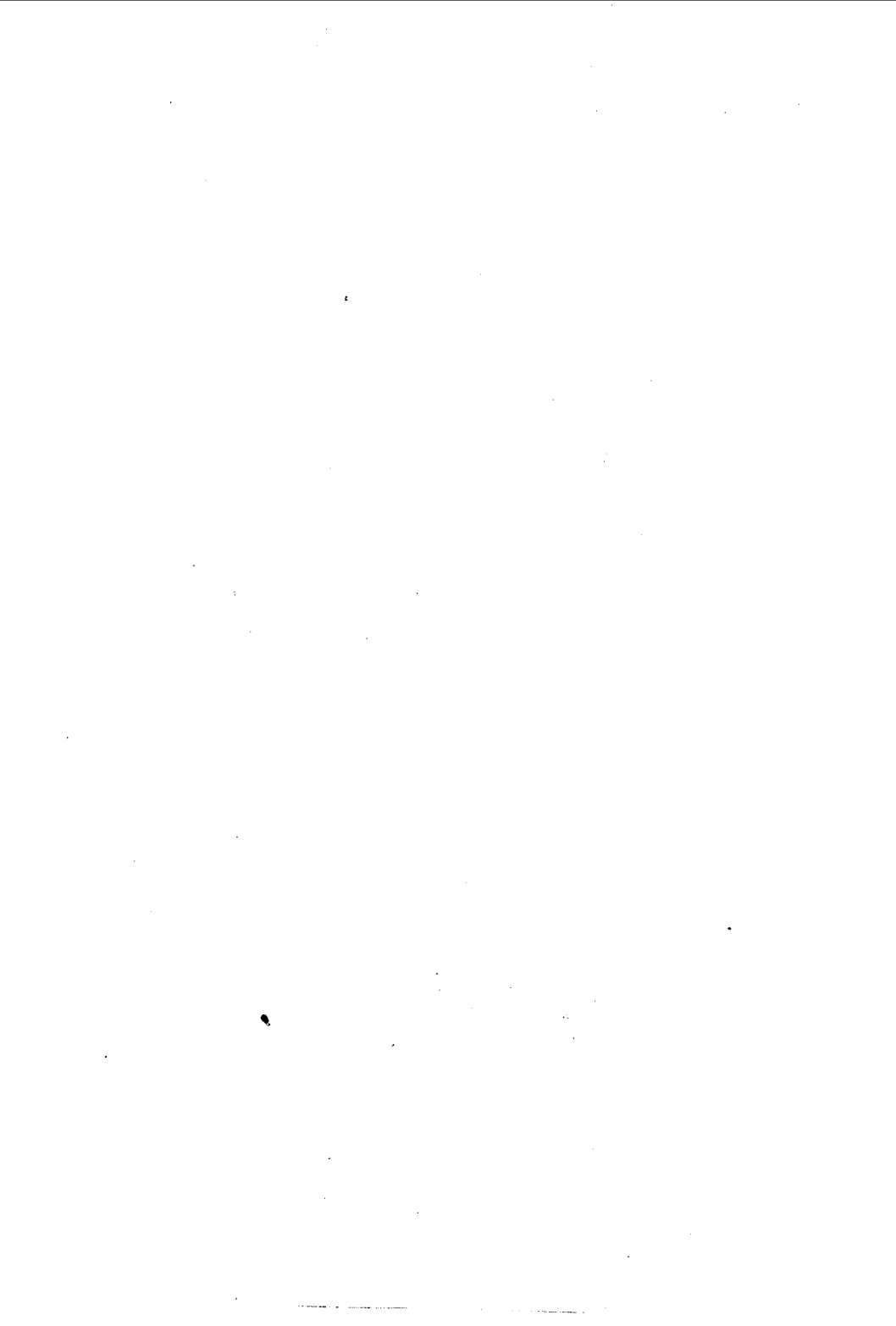
• 文学篇 •

第十三章 和歌格律探源	185
一、和歌翻译形式的争鸣.....	185
二、和歌的格式与韵律.....	187
三、律句与呼吸的关系.....	190
四、音节与音拍.....	192
五、和歌的节奏及五七调、七五调.....	195
第十四章 明清戏曲小说中的倭寇题材	
——明代短篇传奇《斩蛟记》评述.....	199
一、明代的中日关系.....	199
二、倭寇题材研究史述略.....	201
三、《斩蛟记》的故事梗概.....	203
四、《斩蛟记》的作者及作品年代.....	204
五、《斩蛟记》的故事原型.....	207

六、《斩蛟记》评述	210
第十五章 民国时期的日本文学研究	
——谢六逸《日本文学史》评述	215
一、谢六逸与民国时期的日本研究	215
二、谢六逸撰写《日本文学史》的目的	217
三、《日本文学史》的内容与特点	219
四、《日本文学史》在翻译史上的意义	222
第十六章 日本研究书目解题揽要	226
一、书目解题的起源	227
二、综合类	228
三、历史类	230
四、地理类	232
五、宗教类	233
六、思想类	234
七、文学类	235
八、言语类	237
九、政法类	237
十、教育类	238
十一、经济类	238
十二、艺术类	239
十三、结语	240

附：王勇日文著述目录

历史篇



第一章

平安迁都的原因与意义

明治元年（公元 1868 年），维新政府颁布“王政复古”的国诏，同年 7 月改江户为东京，标志武家擅政的封建时代寿终正寝，近代日本揭开帷幕。

翻开日本的历史年表，飞鸟、奈良、平安、镰仓、室町、江户诸朝代，无不以皇都或幕府的所在地命名。石田一良博士将明治以后断为“东京时代”，正是因袭了这一传统^①。

在日本历史上，迁都意味着时代的转折及文化的更迭，那么在 8 世纪后期，日本皇都从平城（奈良）迁往平安（京都），又蕴涵着何种秘密呢？下面从几个方面对这一问题作一探讨。

一、迁都与择地

迁都首先是一种地理位置的移动，然而皇都的择地，自有其严格标准。《和汉三才图会》云：“凡择四神相应之地以为都。”所谓“四神”，即东方青龙、南方朱雀、西方白虎、北方玄武。若以地形而论，则东有河川（青龙）、南有沼泽（朱雀）、西有大道（白虎）、北有高山（玄武），便属理想的帝宅。

地处奈良盆地的平城京，正是“四神相应”的灵地。元明天皇于和铜元年（708年）下《迁都诏》云：“方今平城之地，四禽叶图，三山作镇，龟筮并从，宜建都邑。”（《续日本纪》）

平城京不仅有四神呵护，还有三山（东之春山、北之奈良山、西之生驹山）为之镇关，堪称帝王奠基的风水宝地。

天应元年（781年）桓武天皇即位，翌年诏令废止平城京的造官省，迁都之意已露端倪。延历3年（784年）始迁长冈京，10年后因故废之，重择葛野之地营建新京，于延历13年（794年）下诏迁都，旋易新京而名平安京。

按照传统的奠都准则，平安京实非理想的帝宅，既无四神守护，又无三山环卫。关于其地势之利，桓武天皇仅在《迁都诏》中提到：“此国山河襟带，自然作城。”（《续日本纪》）那么，选择葛野之地，究竟出于何种动机呢？

讨论平安迁都，不能无视长冈京的存在。如果没有藤原种继被杀的突发事件，便不会有平安迁都之议，长冈京也许成为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

关于择地长冈的理由，桓武天皇在诏书中两次提及“有水陆之便”。我们知道，随着律令制度的推广，平城京作为首都的地理环境，跟不上国家规模的发展。三山阻碍交通，大型河流又远离帝京，另营“有水陆之便”的皇都，实是时势所然。

关晃教授指出：“其东面越过逢坂山至近江，经铃鹿、不破、爱发三关，可达东海、东山、北陆三道；其北面位于山阴道的起点；其西面由淀川向摄津进发，从陆路或海路可通山阳、南海、西海诸道。位居交通要冲，是迁都长冈的首要原因。”（《图说日本文化史大系》）

长冈京位于淀川水域，迁都次年（785年）将淀川与神崎川拓通，使贯经皇都的水路直达大阪湾，打开了通往大海的通道，而自古作为旧都外港的难波宫，因失去原有的功能从此一蹶不振。

延历13年（794年），桓武天皇再次迁都。平安京更加远离旧都踟蹰的大和盆地，与长冈京同处淀川水域，自然是水陆通衢之地。

迁都之后，都城东侧的古津改称大津，意在建立一个湖上交通据点，通过琵琶湖与东海、东山及北陆等方面贯通。这样，平安京成了名副其实的水系都城，琵琶湖与大阪湾便是两扇敞开的门户。

综上所述，桓武天皇的二次迁都，不仅摆脱了大和盆地的羁绊，而且在择都标准上打破世代因袭的传统。飞鸟诸京暂且不论，长冈京之前的平城京（710—784年）与藤原京（694—710年），皆生硬地照搬中国的莫都理论，拘泥于虚幻的风水之说。

平城京之“四禽叶图，三山作镇”前已述及，再来看看藤原京是怎样一块风水宝地。《万叶集》中有一首《藤原宫御井歌》，吟咏宫城的地望景观：

东望有青山，青青香具山，
春山正繁荣，为国守东关。
西望有瑞山，祥瑞亩火山，
山峰高入云，为国守西关。
北望有神山，神灵耳成山，

山上生青菅，为国守北关。

南望有名山，名高吉野山，

云居远可望，为国守南关。

藤原京位居大和三山之中，东面之香具山、西面之亩火山、北面之耳成山，俨然为皇都三门，唯独南面的吉野山遥居云端，恰成天子南面之局，这大概是秦始皇“表南山巅以为阙”（《史记》）的翻版。

套用中国的风水思想，必会失去日本的地势之利，这便是巨都平城京遭弃的原因。桓武天皇吸取历代皇都兴衰的教训，立足于本国的实际情况，毅然迁都于水陆要冲之地，弃虚取实，可谓是明智的抉择。在其后的约300年间，日本一反奈良时代对唐文化的盲目模仿，在摄取中加入创意，开创出国风文化的新局面，这种刻意创新的理念，在平安迁都之时已有显露。

二、迁都与革令改政

上面从地理环境的角度，探讨了平安迁都的原因。然而，迁都不仅是地理位置的移动，更主要的是一种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因此，策动者必有所求，而既得利益者或有所失，围绕皇都的去从，各种势力的明争暗斗自然是无法避免的。

关于平安迁都的政治原因，辻善之助博士有过一段著名的论述：“迁都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摆脱盘踞奈良的僧侣及其背后豪族的势力。佛教在奈良时代达到兴盛的顶点，各种弊端因之产生，乃至很难说清政治从属于佛教，还是佛教为政治服务。”（《日本文化史》）

一扫宿弊、刷新政治，无疑是桓武天皇追求的目标，这在迁都的选时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延历3年（784年）迁都长冈京，时在甲子之岁。